

陳國燦 著



學番魯吐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吐魯番學/陳國燦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25-5308-2

I. 論… II. 陳… III. 吐魯番地區-地方史-文集
IV. K294.5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35839 號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蘭州大學“985 工程”敦煌學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
資助

論吐魯番學

陳國燦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m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常熟市新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6.75 插頁 3 字數 290,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5308-2

K·1193 定價: 6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前 言

吐魯番學是一門研究吐魯番及其鄰近地區地上、地下歷史文化遺產的學問，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對其不斷出土的古代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而這項工作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有人涉足了，清朝末年，繆荃孫、楊守敬等學人圍繞着吐魯番所出的《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寫跋語、作評論。隨後羅振玉校錄其文，並作出考訂。1911年王樹枏撰《新疆訪古錄》，特別注意並且著錄了十餘件私家收藏的吐魯番出土文獻，還作了考訂。1914年羅振玉依據日本探險隊從吐魯番所獲墓誌資料，出版了《西陲石刻錄》、《高昌麴氏系譜》等。王國維發表的《唐李慈藝授勛告身跋》及《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也是對出土古文獻作的考釋。然而，這在當時只是對一種出土新資料作的偶發性研究，既沒有對地下文物進行科學發掘的材料作基礎，也沒有對出土材料作出批量的整理，更沒有能結合吐魯番的地域特點作出廣泛聯繫性的系列研究。

1928年以後，黃文弼先生兩次對吐魯番高昌古城、交河古城及其附近的墓葬作了考察、發掘，還調查了諸古遺址、寺窟，使得中國的吐魯番學開始進入到一個實際考察和研究的階段。然而，這一階段的成熟期却在二十世紀的五十至七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後，新疆考古隊對吐魯番古墓葬進行了大規模的科學發掘，七十年代又開始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國家級的整理，其重要的標誌是以唐長孺教授為首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的成立及其成果《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誕生。這意味着中國的吐魯番學已經完全成熟地展現於世界學術之林。在此基礎上，中國敦煌學界、吐魯番學界、西域學界的學人們在討論成立專業學會時，考慮到學術領域的異同特點，決定將學會名稱定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並於1983年9月正式成立。“吐魯番學”這一名稱，就這樣在中國大地上法定地被確立起來。

吐魯番學與敦煌學雖然性質相同，但也有一些歷史性、地域性的特點，客觀地、科學地、深入地分析認識這些特點，也是從事吐魯番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本人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追隨唐長孺先生從事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對吐魯番地區的歷史發展及其出土文獻作過長期的鑽研，對吐魯番地區的東、西、南、北的歷史遺蹟、地形地貌、山澤泉渠及其生態，也不止一次地作過考察，故而一直關注着吐魯番學的發展

及其學科的建設,對吐魯番學的研究對象、內容、性質、價值、意義及其學術史等,也發表了一些見解或議論;對吐魯番學所涉及的歷史及文化,吐魯番文書學的研究方法及內容的擴展等方面,也作過一些歸納和自我總結。不論是否正確,現均將其呈現出來,以就教於學術界和愛好者,同時也是作為進入到新世紀以後,對吐魯番學建設的一份獻禮。

目 錄

前言	1
火焰山下的古代文明與吐魯番學研究	1
對新世紀吐魯番學發展的展望	10
吐魯番歷史上的四個千年	15
吐魯番文書在解放前的出土及其研究概況	22
中國吐魯番文書的研究進展與展望	40
《吐魯番出土文書》簡介	52
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分類與定名	57
略論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中的史學斷代問題	71
從敦煌吐魯番學看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	80
敦煌吐魯番文書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	86
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與唐史研究	104
略論吐魯番出土文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關係	113
略論日本大谷文書與吐魯番新出墓葬文書之關聯	122
中、英、日、美、德各國所藏吐魯番文書相互之間的關聯	136
東訪吐魯番文書紀要	141
美國普林斯頓所藏幾件吐魯番出土文書跋	153
遼寧省檔案館藏吐魯番文書考釋	164
《俄藏敦煌文獻》中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	178
略論吐魯番出土的敦煌文書	188
鄯善新發現的一批唐代文書	200
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的新進展	218
漫卷簾衣延草色 欲回春氣入書叢 ——對唐長孺師研究出土文獻方法的體會	228
柳洪亮《新出土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序	235

小田義久著《大谷文書研究》評介	238
《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評介	248
關於吐魯番墓葬中所出四神圖像問題 ——對小田義久教授來函的一封回信	253
韓樂然的絲路紀行	257

火焰山下的古代文明與吐魯番學研究^{*}

兩周前在新疆吐魯番召開了有一百多位中外學者參加的“吐魯番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會上成立了由中央批准的“吐魯番學研究院”。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一件大事，有必要向高層學術界的朋友們介紹，吐魯番學究竟是一門什麼學問？它的基礎及內涵是什麼？這門新學的意義與價值何在？它與今天現實政治生活究竟有何關係？這正是我今天以“火焰山下的古代文明與吐魯番學研究”為題向大家報告的主旨。

一、火焰山的特殊地理環境保存着極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著名小說《西遊記》中描寫的孫悟空等陪同唐三藏往西天取經路過的火焰山，實際地點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東部，是天山山脈中的盆地——吐魯番盆地內一座由西迤邐而東的小山，長約近百公里，高三、四百米，橫臥在盆地中央。由於盆地四周高山環繞，陽光輻射強，熱量難以散發，使得這裏高溫少雨，夏天溫高可達46—47℃，故有火焰山之稱。

幾千年來，盆地的生靈，全賴北部天山的雪水所澆灌、所養育。而乾燥的氣候，又使火焰山的南、北、東、西的地上、地下有機物，長年不腐，故數千年來遺存下來的許多珍貴文物，得以保存至今，為再現古代先民的生活、思想及各種活動，提供了如實的物質基礎。

吐魯番是中國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東靠河西走廊，連接着長安、洛陽；西通西亞，直抵歐洲，是古代中國通向西方的重要門戶。它又地通南北，是聯結天山南北的通道口，這就使吐魯番成為歷史上多個民族交往、移徙、融合的場所。同時又是各種外來文化，如印度佛教文化、希臘—羅馬基督教文化、阿剌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彙聚交流之地。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吐魯番在古代的特殊歷史地位，給它積澱了絢麗多彩的古代文明；而特殊的自然環境，又給火焰山南、北、東、西的這些古代文明，提供了優越

^{*} 本文是2005年9月14日在武漢大學博士後學術論壇上作的演講。

的保存條件。

在盆地內，有古城遺址十餘座，其中以高昌古城、交河古城最大，延續近兩千年。城內衆多的居民遺址，大小宗教寺廟、佛塔，至今仍歷歷在目，常出土衆多的文物，如晉唐以來的漢文、梵文、吐火羅文佛教寫經、壁畫、佛像、碑刻，摩尼教回鶻文寫經、壁畫，景教壁畫，各種絲織品、藝術品和器物。

漢唐以來的古墓群在盆地有數十處之多，如阿斯塔那古墓群、哈拉和卓古墓群、洋海古墓群，都是世所罕見的地下民間博物館。有各類陪葬物品、墓室壁畫、墓誌、墓表。更爲可貴的是諸墓葬中常有各種官、私檔案文書附葬，這些十六國至隋唐的文書，書寫在紙上，逾千年至今，字跡仍清晰可讀。迄今爲止，已出土的各類古紙文書，約有三、四萬件號，這就是著稱於世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它是各個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客觀真實記錄，與敦煌藏經洞所出文書交相輝映。

火焰山有多條由天山雪水冲刷而成的溝谷，在每個大的溝谷裏，都有古代開鑿的寺廟洞窟，以佛窟居多，也有祆教、摩尼教、景教洞窟，留存着各種教義的精美壁畫，也遺存下來大批漢文寫本、印本經卷，還有多種民族文字，如梵文、吐火羅文、波斯文、希伯來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鶻文、西夏文的寫本和社會世俗文書。

如此衆多的歷史文化遺產，集聚於吐魯番，真是世所罕見。它爲世人所矚目，也引起了人們的驚奇、探索、思考和研究，於是也就出現了以這些地上、地下歷史文化遺產以及這個地域爲主要研究對象的吐魯番學。

二、吐魯番學的緣起及對學術史的回顧

中國吐魯番學的發展，若論其源流，可追溯到清代中葉。自乾隆最後平定新疆以來，中國西域地區的歷史、地理、民族及文化，引起了國人極大的關注。乾、嘉以降，官宦學人西行考察、踏勘調查者，接踵而至，其考古見聞、行程記事的著述，紛紛刊行於世，如乾隆間出版的椿園著《西域見聞錄》，其後祁韻士的《萬里行程記》、《西域釋地》，俞浩的《西域考古錄》，徐松的《西域水道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等等，都或多或少地關注並記述了吐魯番盆地及其周邊的山川、地理、形勝、民族以及歷史文化遺蹟。這些著述雖然還不能算是深入的、科學的研究，也談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吐魯番學，但却是中國吐魯番學之濫觴。它是與當時國家新統一、民族新聯合、邊防需要建設的形勢相聯繫的。從這一歷史背景看，吐魯番學的源起，比之於敦煌學的起始要早。

洎至近代，中國面臨着世界列強的侵略，民族危機驟起，西北邊疆遭到沙皇俄國的

蠶食,加之各個國家的探險隊、考察團紛紛來到天山南北,特別是吐魯番盆地這個有豐富歷史文化埋藏的地域,進行文物的調查、探檢和盜掘。這也刺激着國人,有的憤起爲痛失國寶扼腕急呼,有的也致力於收藏地上、地下出土的文物,或着手進行研究、論證,從此也就走進了近代吐魯番學的大門。1905年,前清官員端方往歐洲考察,在柏林博物館見到了德國普魯士探險隊從吐魯番運去的《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他在驚訝之餘,拓得數紙帶回國內,由此引起了國人的震驚,也引起了中國學術界對吐魯番出土古文獻極大的關注和興趣。學者們如繆荃孫、楊守敬等人紛紛作出跋語和評論,1907年羅振玉還校錄其文,作出考證,隨後發表在《神州國光集》第六集上。這應是中國文化學術界對吐魯番出土文獻關注的開端。

1911年王樹枏撰《新疆圖志》卷八七《古蹟志》(單行出版名《新疆訪古錄》),登錄了著名的《唐張懷寂墓誌銘》及各私家收藏的吐魯番出土文獻等十餘件,並對每件文獻作出考訂、研究或說明。1914年羅振玉出版《西陲石刻錄》,及時公佈了日本大谷探險隊從吐魯番帶走的墓誌、碑刻文獻,並作有跋語說明。與此同時,羅氏還根據諸石刻墓碑提供的資料進行研究,並作成《高昌麴氏系譜》。1916年羅振玉又出版《高昌壁畫菁華》,向國人介紹了被德國探險隊攜往柏林的吐魯番石窟壁畫精品。1923年前後王國維發表的《唐李慈藝授勛告身跋》及《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即是結合出土古文獻對吐魯番歷史進行的研究。這些都是中國吐魯番學早期的成果。

1928年,中國的學術團體協會面對着世界列強派出各類探險隊到中國西北進行探險、掠奪的現實,組成了中國自己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開展了中國學術界對吐魯番等地的第一次科學考察,考察團成員黃文弼氏於1928、1931年兩次對吐魯番高昌古城、交河古城及其附近的墓葬作了考察、發掘,還調查了諸古遺址、寺窟,這是中國吐魯番學劃階段的大事。如果說在此以前中國學術界對於吐魯番的歷史文物和文化還只限於介紹和認識階段的話,那麼,自1928年以後則進入到了實際考察和研究的階段。

1931年2月黃文弼氏發表了《高昌》(第一分本),5月又發表了《高昌專集》(第二分本),將他在吐魯番考察發掘所獲的高昌王國至唐代的122件墓碑磚文悉數公佈,並作出考訂,在此基礎上,他還對高昌王國麴氏王朝的紀年和職官系統作了研究。1933年黃氏又將吐魯番墓葬中所獲得的陶器加以整理,彙集出版了《高昌陶集》。接着他又撰寫了《吐魯番考古記》,敘述了他在吐魯番的考察經過,刊佈了15件出土古籍、古佛經寫本和印本,還有高昌、唐代、元代的社會文書26種,以及一批回鶻文字的古寫本、印本文書,此外還有壁畫、佛像、古錢等文物,並於1954年出版。黃氏還發表了《羅布淖

爾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所有這些考古成果及其文書、文物的公佈，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學術界對吐魯番學的認識。學術界開始意識到對於吐魯番出土文獻的研究，不僅要與史籍，而且還應與墓葬碑誌、文物遺蹟結合起來進行考察；還應更多地與新疆各地的歷史、出土文獻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活動，雖然也曾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資助，但畢竟還是民間學術團體的行為，在人力、財力和活動上也極其有限，儘管也取得了不少學術考察的成果，然而在大規模發掘、反覆考察、深入研究等方面，往往出現捉襟見肘的情形。1931年中國學術界積極籌備第二次“西陲學術考察團”，最終由於經費無着而作罷。

三、吐魯番學成為國際顯學的歷史背景

吐魯番學的故鄉在中國，然而，歷史發展到近代後，當世界列強的各個探險隊來到吐魯番時，這門學問一開始就具有了國際的性質。

十九世紀後期，沙皇俄國在中亞的擴張取得勝利之後，仗着地理上的優勢，不斷派出人員進入我國新疆，進行各種活動，其中不乏一些考古學家、探險隊來到吐魯番，對這裏的歷史文化遺存進行考察、盜竊。

1893年，羅波洛夫斯基(V. J. Roborovsky)、科茲洛夫(P. K. Kozlov)到吐魯番來建立氣象站，1895年離開時，便帶走了一些吐魯番佛窟裏的古佛經寫本和回鶻文寫本。1897年，俄國考古學會會長克列門茲(D. Klementz)到吐魯番，探查了130個佛窟，並將其中一些精緻的壁畫、銘刻和許多古寫本盜運往俄國，隨後還發表了《吐魯番及其古蹟》的文章，這些文物，至今還存放在聖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裏，其文書則收藏在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1902—1907年，德國組成了“皇家普魯士吐魯番考察隊”，對吐魯番地區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文物盜竊活動。其領導人格倫威德爾(A. Gunwedel)在第一次劫走46箱文物回國後，發表了《1902—1903年在高昌古城及其鄰近地區進行考古發掘的報告》，並於1906年在慕尼黑出版。第二次是1904至1905年8月，由勒柯克(A. Von. Le-Coq)領導，他們在吐魯番的柏孜克里克、吐峪溝、勝金口等千佛洞和高昌古城內的王宮、寺廟遺址，進行了大肆盜掘和壁畫切割，1905年10月從吐魯番運走了各種文字古寫本、經卷、錢幣、雕像、石刻、壁畫和其他文物藝術品，總共103箱。1912年勒柯克在柏林出版的《高昌—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一書，其中刊載的多幅“說法圖”，就是從柏孜克里克

第9窟(現編爲20號窟)中切割去的。著名的《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以及《高昌主客長史造寺碑》,也是在高昌古城掘得後,通過這一批盜運走的。第三次是1906—1907年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聯合進行的,前一段他們在庫車和拜城的克孜爾、庫木吐拉、森木塞木、焉耆等千佛洞進行盜竊搜尋,後一段則在吐魯番、哈密等地作了再盜竊,此次共運走文物128箱。1912年格倫威德爾在柏林出版的《中國突厥斯坦的古代佛教寺廟》一書,主要是對這次所竊文物的報告和研究。

從1902年8月起,日本的西本願寺長老大谷光瑞,也組成探險隊,到新疆進行“探險”,前後共有三次。大谷探險隊第一次探險是1902—1904年,有渡邊哲信和堀賢雄等人,先在于闐,後又轉往庫車和拜城,在克孜爾、庫木吐拉等千佛洞進行了搜尋,在庫車的都列都爾·阿護爾古遺址作了發掘,後來二人都發表了他們的《西域旅行日記》。第二次是1908年11月至1909年5月,由野村榮三郎和橘瑞超帶領,在吐魯番的交河古城和吐峪溝等地作了搜尋。第三次是1910年10月至1913年5月,由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分頭在敦煌、吐魯番的七克臺、勝金口、吐峪溝、交河古城諸遺址和阿斯塔那古墓群作了發掘,獲得了大量高昌王國至唐代的社會文書以及古寫本典籍和佛經殘片。這些被運往日本後,通稱之爲“大谷文書”。1915年日本出版的《西域考古圖譜》,即刊載了其中極小的一部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日本學術界組成西域文化研究會,對大谷探險隊所獲的這批文物,其中包括社會文書、佛教經典、文化藝術品等,進行了集中的研究,學術成果不少。近年,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小田義久教授又完成了三卷《大谷文書集成》的編撰。

到吐魯番盜掘文物的還有英國的斯坦因(A. Stein),他作爲英印政府教育部的官員,曾多次到中國西北進行文物盜竊,第一次是1900—1901年,主要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南緣諸沙漠遺址中進行考古發掘,他於1907年出版了兩卷本的《古代和闐》。第二次是1906—1908年,他從和田到樓蘭遺址、再轉到敦煌,在掘得大批漢簡後,又從敦煌莫高窟獲得大批古寫本,然後轉往吐魯番、焉耆、庫車、和闐等地作了考察和發掘,後於1921年出版了五卷本的《塞林地亞——在中亞和中國西部地區考察的報告》。第三次是1913—1916年,他又經塔里木盆地的南緣到樓蘭遺址,轉到敦煌、黑城(哈拉浩特)遺址,再往哈密、巴里坤,越天山來到吐魯番,他在柏孜克里克割剝的壁畫就裝滿了一百多箱。在阿斯塔那墓地,他將墓群劃分爲10個墓區,共發掘了34座墓葬,其中出有北涼、高昌國、唐代的文物、文書或有文字記載者21座。對於這一次的盜竊所獲,他經過整理於1928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亞洲腹地——在中亞、甘肅和伊朗東部考察的報告》。

以上所列只是幾起大的外國探險隊對吐魯番地區文物的掠奪,其餘小股的還有很多。這也是在當時中國處於帝國主義侵略、民族面臨重大危機、國弱民窮情況下必然會發生的事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地走過來的,我們承認歷史,也永遠不會忘記那段傷心悲痛的歷史,但是我們更應該着眼於現實,着眼於今天吐魯番學的發展。

當吐魯番的歷史文物被劫往彼得堡、柏林、京都、倫敦、新德里等地後,世界各國的漢學家們,以及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地理學、宗教學的學者、藝術家們,都紛紛對這些出土文物和文書開展了研究,不斷發表他們研究的新成果,這無疑豐富了吐魯番學的內容,也促進了吐魯番學的成長和發展。他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既可以補中國學術界研究之不足,又可以開拓中國學者的眼界,提高中國學術研究的水平,從而加強了中國學術界與他們的交流。所以說吐魯番學在其誕生之初,就是一種世界範圍內的學問,發展至今仍然處於國際顯學的地位,這都是由於其形成的特殊歷史時代背景所賦予的。因此,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面對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們對吐魯番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應該充分地加以尊重和歡迎,更應該與他們攜手合作,共同開拓吐魯番學的新領域,使這份珍貴的人類歷史文化遺產,這門國際顯學,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發揚光大。

四、吐魯番學在共和國成立後的新進展

中國的吐魯番學,比之於敦煌學的發展還有所不同。敦煌藏經洞的文獻雖然大部分被竊往國外,但畢竟還有相當一部分留在國內;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畫、雕塑,基本上沒有遭到破壞,給學術界提供了較為完整的研究對象。而吐魯番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地上地下的文獻、文物,悉數被劫往國外,佛窟中的壁畫也大多被竊割而去,缺乏研究的實物和依據。因此,在二十世紀的前半個世紀裏,中國敦煌學的研究,遠遠超過了吐魯番學。在此期間,如果說吐魯番學還存在着的話,也是靠羅振玉、馮承鈞、金祖同等先生從東、西方引進的資料,靠黃文弼等先生極有限的發掘資料來做些研究。

中國吐魯番學真正取得新進展,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隨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成立,自治區也相繼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館及考古工作隊,不久吐魯番地區也有了文物保護管理所。在自治區政府的領導下,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隊對吐魯番地區的古城遺址、佛教石窟、各種古文化遺存及文物,進行了普查,同時還進行了一系列必要的維修和保護。在國家的資助下,從1959年起,開始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葬群進行有計劃的考古發掘。直至1975年,前後大規

模發掘 13 次,在所掘 456 座墓葬中,出土了內容極為豐富的各類文物,其中有 203 座墓葬出有十六國、高昌王國及唐代的紙質文書近萬片。新疆博物館考古工作隊邊發掘,邊整理,邊發簡報,使學術界及時知道吐魯番考古學方面的進展,這是吐魯番學學術發展史上劃階段的大事,也是新疆考古專業工作者們對吐魯番學作出的傑出貢獻。

1975 年,在國家文物局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以武漢大學唐長孺教授為首的全國專家學者組成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及時對這批文書展開了研究和整理,並於 1981 年起,陸續出版了經過細心整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先出版了十卷本的錄文本,後又出版了大四卷本的圖版本。這項工作的開展及其成果,標誌着中國吐魯番學的研究躍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顯示出中國的吐魯番學,已全面走上了自行發展、自主研究的道路。圍繞着新出土的吐魯番文書,國內學術界開展了熱烈的研究,發表了大量具有創見性的新研究成果。在出土的民族文字,如吐火羅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鶻文、吐蕃文、蒙古文等文書方面的研究,也出現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佛教石窟、古城遺址方面,也多次進行了調查、登錄、攝影、清理、保護性的維修和研究,在這方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文管所(現為地區文物局)及其博物館的專業工作者們,做了大量辛勤、艱苦的工作。

1983 年,我國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從此中國敦煌學學術界就有了一個組織、協調、交流、研究的學術團體,考慮到敦煌學與吐魯番學既有共性,又有其不同的特點,故學會定名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吐魯番學的名稱就這樣在中國大地上被權威性地加以確定了,這無疑會促進吐魯番學向高層次的發展,促進學者們在有些方面,根據吐魯番學自身的特點和範疇來開展研究工作。

值得特別提到的是,八十年代以後,在吐魯番地區逐漸形成了一支自己的文物專業隊伍,建立了自己的地區博物館,對各個重點文物遺址,也逐步建立了保護所。為配合地方建設,地區博物館也能進行一些搶救性的發掘和清理,並能及時發佈簡報。這些可喜的新進展,與吐魯番地委、行署的領導和支持分不開,同時也與堅守吐魯番文物工作二十餘年,不久前因公殉職的柳洪亮博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在他的主持下,吐魯番的文物工作者們清理、研究了一些新出土的墓葬文書,出版了《新出吐魯番文書及研究》;在清理、調查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之後一系列研究的基礎上,他們又出版了《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藝術》;翻譯了一些國外對吐魯番考察的行記及研究;為配合吐魯番旅遊事業開展,他們還編輯出版了《吐魯番博物館》、《吐魯番》等大型圖冊以及《吐魯番旅遊指南》,此外還有許多吐魯番文物普及性的工作及其成果。除此之外,他們還

承擔並完成了“柏孜克里克石窟文書殘片的整理和研究”的項目。所有這些表明,在吐魯番學的故鄉,一支文物考古的專業隊伍正在成長壯大。

在吐魯番地委和文物局領導下,2005年8月,在吐魯番召開了有一百多位中外學者參加的“第二屆吐魯番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學術論文60餘篇。會議並成立了“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獲中央批准。在進入新世紀時,地區文物局又制定了《吐魯番地區文物保護與利用總體規劃》;由新疆吐魯番學學會和吐魯番地區文物局主辦的一份新學術刊物《吐魯番學研究》也誕生了,至今已出版八期,辦得有聲有色,頗具學術水平。它為中國吐魯番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塊新的學術園地,這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領域裏綻放的一朵絢麗的新花,必將會為吐魯番學的發展作出長期的學術貢獻。

五、吐魯番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吐魯番學既為中國多民族融合的歷史豐富了史實內容和證據,又給一系列現實政治問題作出了有歷史依據的正確回答。為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國際恐怖主義提供了歷史的、理論的基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回鶻人來到新疆以前約一千年,漢人就來到了這裏。公元前一世紀,天山南北生活着許多小的部族,如于闐、疏勒、龜茲、焉耆、姑師、樓蘭等,張騫通西域,將三十六個這樣的部族聯合起來,統領在漢王朝的“西域都護”之下。儘管其間有聯合,也有鬥爭,但總趨勢是接受漢王朝的統治。到魏晉時期,新疆又置於“西域長史”管理下。公元四世紀,吐魯番建立了高昌郡,其後又由漢人將其擴大為高昌王國。到了唐代貞觀十四年(640),改建為西州,隸屬於唐安西都護府,一直在漢族統治者的治理之下。吐魯番出土的大批唐安西都護府及西州的官府文書,就充分證實了這一歷史事實。因此,正確地說: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它是由各族人民共同開發締造的。

從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中,既能看到摩尼教的文書,又可見到大批佛教經典,這表明維吾爾人的祖先曾信仰過摩尼教,南遷以後又逐漸信奉佛教,只是到了十四世紀以後,才逐漸改信伊斯蘭教。可見一個民族與某一宗教並非永遠天然聯在一起,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是在變化着。極少數宗教狂熱分子,却將某個宗教推向極端,並在某些民族中將其封閉固化,這完全是為民族分裂主義開道的別有用心的陰謀,它違背了各民族間文化的自由交流,違背了歷史的客觀發展規律,最終也必然會歸於失敗。

在吐魯番出土的漢文和各種民族文字文獻中,可以看到衆多突厥人在這裏與漢人共同生產、友善交流、和睦相處的記錄。誠然,隋唐時期的西突厥貴族,也曾企圖在天

山以北建立獨立王國。不過,在强大唐王朝的治理下,他們的分裂圖謀則一敗再敗,甚至遭到許多西突厥上層的反對,始終未能得逞。今天,境外的一小撮東突厥斯坦主義分子,爲了實現其破壞中國統一、破壞新疆民族團結的目的,居然撿起了一個從未出現過的、被歷史所遺棄的破碎夢想,宣揚所謂的大突厥主義,來蠱惑人心,欺騙人民,甚至不惜用恐怖的手段,製造災難,借此來實現其野心,這違背了漢、維千年來相依爲命、世代友好相處的民族團結傳統,也違背了新疆歷史發展的具體規律,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從吐魯番出土的漢文和各種民族文字的宗教文書中,可以明顯看到,各種經典、教義、修功德記、碑刻,不論是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還是伊斯蘭教,都有一個共同的主旨,就是勸人爲善、與人爲善、棄惡從善,崇尚和平、光明,爲衆生祈福。今天,一小撮宗教極端主義分子,違背了他們先輩的這些正派善良的傳統,鼓吹暴力,甚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濫殺無辜,製造社會混亂,以求一逞。他們不知什麼是人性、善良,是地道的傳統宗教信仰的叛徒。

面對今天的現實作聯繫性的思考,我們更加感到吐魯番學研究的重大價值和意義。只有對歷史作更如實具體、更細緻深入的研究,才能總結出正確的歷史結論來,爲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立言,爲現實的政治生活服務。

對新世紀吐魯番學發展的展望^{*}

吐魯番盆地的地上地下，蘊藏着極為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上起石器時代至周、秦，下迄明、清，既有漢族的，也有北方各個民族留存下來的實物或文字記錄。這些都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對這一特定地域的歷史文化遺產進行維護、整理和研究的學問，被稱之為吐魯番學。

吐魯番學，與敦煌學一樣，都是結合自己地方特色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遺產進行研究的學問，具有許多共性。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加以比較，又會發現他們有着許多不同的特點。首先，就歷史文化遺蹟的情況看，吐魯番具有世上罕見的古城遺址，除高昌、交河古城外，還有衆多的大小城堡遺址，在古城的周圍，又散落着無數的古墓葬群，而在古墓中，又往往有紙質文書和各類文物相伴而出，這些特點在敦煌並不具備。其次，就出土古文書的狀況而言，敦煌文書主要來自莫高窟藏經洞，早已搜尋告罄，公之於衆，新增面世者極為有限。而吐魯番文書，特別是社會文書，主要來自墓葬，從發展看，其潛藏尚多，新發現的前景無限。第三，就文書時代而言，敦煌文書多集中在唐五代至宋初。吐魯番文書，則既有唐前期，又有大量晉末十六國、高昌王國時期的文書，在研究中國古代西北地區歷史文化上，可以互為補充。第四，敦煌具有莫高窟、榆林窟等一批保存完好、世所罕見的佛教藝術寶庫，吐魯番雖然過去也曾經擁有過，但大都已被破壞。第五，在中唐以前，敦煌和吐魯番兩地，基本上走的是相同的道路。中唐以後，敦煌被吐蕃統治六十餘年，而吐魯番則進入回鶻統治時代。這又決定了敦煌出有許多吐蕃文書以及吐蕃文化遺蹟，吐魯番則有更多的回鶻文獻及其文化遺存。

吐魯番學只有在明確了自己的特點以及優勢和劣勢之後，才能在自己發展的方向上，揚其所長，補其所短，才能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來。在進入新世紀後，吐魯番學面臨的研究課題非常之多，有基礎建設方面的，也有探討研究方面的。

在基礎建設方面，吐魯番學至今還缺乏幾本大帳。一個就是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外國的探險家們，究竟到吐魯番來過多少次？屬於哪些國家？拿走了哪些地上地下文物？

^{*} 本文為發表於《吐魯番學研究》2003年第2期上的《吐魯番學研究及其芻議》一文的最後一部分。

現藏在何處？圍繞着這些文物，他們做過哪些重要考古發掘報告和主要的研究？這方面國內外一些學者也做了一些調查研究。在他們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加以系統化、完整化的工作十分必要，這本大帳做好了，就能對海內外的吐魯番文物，做到心中有數。

第二本大帳是編制吐魯番出土文書總目錄，這其中包括國內各地所藏和流散到海外各國收藏的文書，因為在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吐魯番出土的各種文字的文書，流散到海外各地，一直缺乏一個統一的目錄。這種家底不明、心中無數的狀況，不應該再持續下去，它既不利於對文書深入研究的開展，又不利於我國吐魯番學與國際間的交流。因此編制一個完整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目錄或文書研究論著索引目錄十分必要。目前，我們正承擔着國家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總目錄”的編制項目，預計近年內可以完成出版。

第三本大帳是共和國成立以來吐魯番古墓葬十餘次大型發掘的考古報告。過去已有過若干次的發掘簡報或報導，然而，系統、詳細的發掘報告，至今尚未出來。究竟哪些墓出土了哪些文物？這也是一份吐魯番學的家底帳，如果能系統作出學術報告，也是一項大的基本建設。現在，吐魯番墓葬出的文書，早已系統整理出版了；吐魯番歷來出土的磚誌，也經穆舜英、王炳華編的《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新疆卷》和侯燦、吳美琳編的《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加以整理出版。我們殷切地期待當年參與發掘的專家們，再接再厲地將考古發掘報告儘快整理出來，貢獻於吐魯番學界。

第四本大帳是吐魯番地區內現存古遺址的詳情登錄，這其中包括古城、鎮戍、烽堡、石窟、古墓葬群及其他古遺址的測量、攝影、繪圖的詳細記錄和說明。這是文物工作建設的百年大計，即使將來某個遺址出現毀壞，我們也能有數據可查，並據之加以恢復。這方面的工作，一百年前的英人斯坦因倒是做過一些，都刊佈在他的《亞洲腹地》一書中。今天我們應該在他已經做過的工作基礎上，全面深入地展開，整理出一套詳細的吐魯番考古資料及圖錄。應該說，到目前為止，在吐魯番境內所存的古代鎮戍、守捉、烽燧遺址究竟有多少個？還是不清楚的。因此，欲達此目的，還必須要做大量深入細緻的調查和比較研究才行。

在探討研究方面的課題也極其豐富，有政治、經濟、民族、軍事、交通、地理、文化等方面。

在政治方面，大到吐魯番盆地在歷史上歷朝歷代的政治歸屬，小到吐魯番這個地區為什麼稱之為“吐魯番”，高昌王國、西州回鶻王國何以能長期持續存在，十六國時期的高昌郡府、唐代西州州府的行政運作體制是如何進行的？政府與軍府之間的關係，